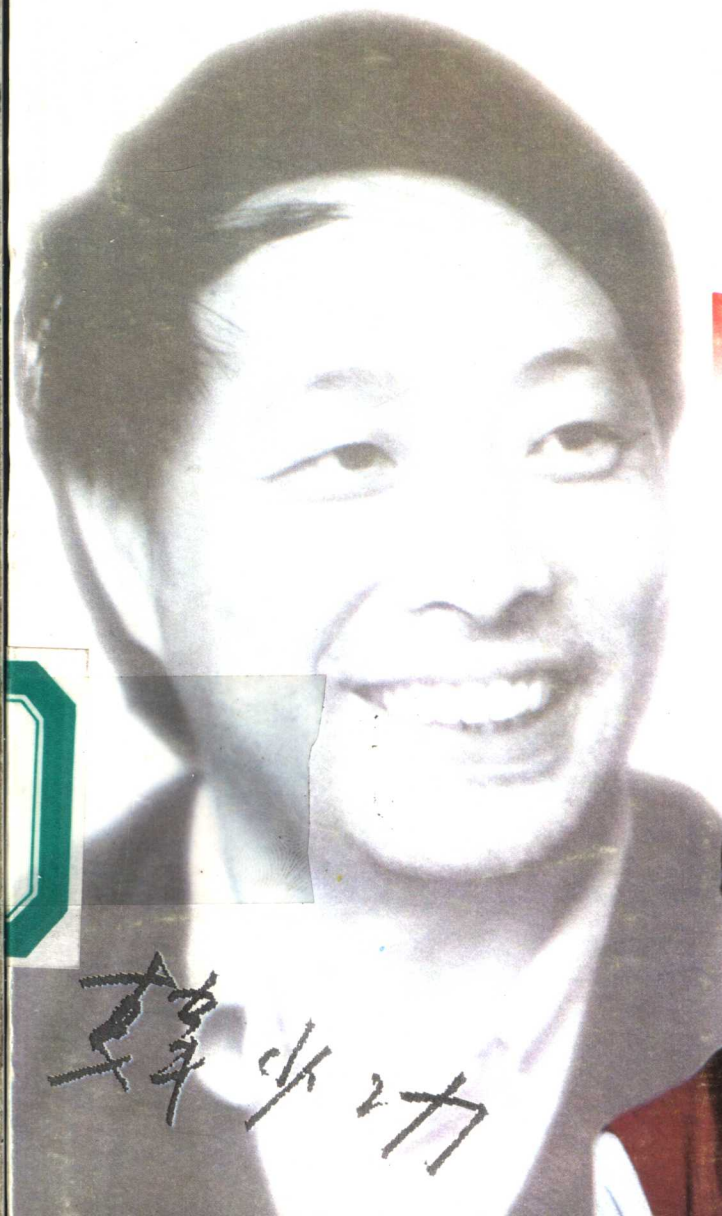


韩少功

当代名家寄语青年丛书

顾问 / 冰心 主编 / 王蒙
当代名家寄语青年丛书

灵魂的
声音



韩少功



(吉)新登字01号

灵魂的声音

韩少功 著

谷艳秋 邢宜哲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60 000 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 301—15 400 册

ISBN 7-206-02441-6

G·609 定价:15.00 元

淡泊以明志
寧靜以致遠

冰心



十一
五
一九九五

心中多想大事
手上多做小事

——与青年朋友们共勉

韩少功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倾诉和倾听

(总序)

写作的时候总会或多或少地想到读者，会自然而然地把读者看做自己的朋友。写作是一种倾诉。

而文学作品的读者中一大部分是青年人，这丝毫也不奇怪。正是青年人更富有读书、也就是吸收和对话的热情，正是青年人更容易为文学作品的感情而激动，为文学作品的思想而动脑筋而中夜无眠，正是青年人对文学作品的态度也就是对于作家的态度更加当真，更容易受到一些作品的影响，更容易倾听作家的声音，也更强烈地对于作品做出这样那样的反应。

作家的许多文字实际上是对着青年人讲的。吉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这套作家寄语青年丛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这一批书的作者则都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他们大体上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青年，他们经历了我们祖国的许多风风雨雨，他们的岁月峥嵘却又蹉跎，辉煌却又坎坷，激越却又浮华。临近老年或到了老年时期以后，他们也许有太多的话要说。事实证明，记忆是无法一代又一代地保持下去的，对于某一代人刻骨铭心的东西，另一代人却觉得匪夷所思，觉得不太真实，觉得早就

该忘却了,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这都是可能的。但同时,历史又是活在现实之中的,一代人用眼泪,用鲜血,用跌跌绊绊的鼻青脸肿换来的经验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这样,寄语青年,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了。

反过来说,青年人也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的反馈,也可以寄语作家们,也可以以新的姿态来鼓舞和启发饱经沧桑的一代人。倾诉和倾听,这都是可贵的。

王 蒙

1996年3月12日于北京

自 序

1993年以前，我的书在一些出版社出版，相互之间从来没有重复。这是为了尊重出版者，也是为了尊重读者。到后来，却不过一些出版社的一再热情邀请，编选出版文集时还是有了一些部分的重复，一些自己或者他人认为好一点的作品，分别编入了不同的文集。尽管这样，我对重复出版（哪怕只是部分的重复）仍然心存惭愧，好像自己是一个虚报冒领者，无理窃占了编辑的精力、印刷厂的纸张、还有读者手里购书的钱。因此，当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和王蒙先生邀请我参加这一套丛书时，我颇感为难，一再婉辞。我写的东西实在太少，把已经出版过的一些旧文编选起来再出版一次，对读者有什么好处吗？

另一方面，这一套丛书名为“当代名作家寄语青年”，照出版社编纂方案上的说法，意在“发挥文学的社会教化职能作用”，对青年起一种“教化、促进、提携”的作用。我的作品能否起到这种作用？自己是没有什么信心的。我承认，我的思索与感觉，想象与回忆，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比我年轻的一代来说，则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各个不同的历史处境，都经历着另一代人不可能完全体会的

人生长旅。他们的信念与知识，只可能来自自己独特的人生实践，而不可能来自前人书本上的教诲。也就是说，他们的真理，只可能由他们自己创造，而前人的经验，充其量只是创造者的一种借鉴与参考。我在少年的时候，就很不满意某些长者盛气凌人的一味指责和一味教导，不满意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后人的某些做法。因此，当青年朋友们读到我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不要乖头乖脑地盲从。他们的挑剔与怀疑，他们的挑战与超越，他们深深根植于实践的创造勇气和创造智慧，应该成为阅读的必要前提。这也是我对他们最重要的寄望之所在。

每一代人，都应该成为独特的创造者。

在创造者与创造者之间，才有共同的语言——写作与阅读才可能是一件有意义有趣味的事情。

我终于同意参加这一套丛书。我需要做的只是提醒读者，如果已经购买了我的散文集《夜行者梦语》、《海念》、《圣战与游戏》以及小说集《北门口预言》、《诱惑》的读者，不必再买这一本书。这本书里的大部分作品，已经散见于那些集子。这样的话，您可以节省几块钱。

韩少功

1996年3月2日

目 录

总 序 王 蒙

自 序 (1)

灵魂的声音

完美的假定 (1)

性而上的迷失 (17)

灵魂的声音 (31)

看透与宽容 (36)

伪小人 (41)

南方的自由 (45)

个狗主义 (48)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50)

然后 (55)

安妮之道 (60)

记忆的价值

夜行者梦语 (64)

阳台上的遗憾 (74)

回望	(77)
无价之人	(80)
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85)
听舒伯特的歌	(88)
在小说的后台	(90)
岁末扔书	(96)
心想	(99)

民族的长旅

多义的欧洲	(116)
民族的长旅	(121)
世界	(124)

小说节选

关于记忆 (两则)	(143)
那年的高墙	(148)
关于某一种学风	(154)
关于文化盲区	(158)
布珠寨一日	(162)
访法散记	(170)
仍有人仰望星空	(182)
美国佬彼尔	(191)

编后记	(199)
-----------	-------

灵魂的声音

完美的假定

—

回顾一下30年代，也许会使现在很多人大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色30年代”，批判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卫队员，不会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一般上流开明人物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壮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A. 勃勒东、阿拉贡、加缪、德莱赛、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

60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五月”也惊天动地，小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

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民族，竟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作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每一次左向的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的反复和循环。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特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10年到20年之间。

30年代以后是50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半自由化转向，中国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谏诤，苏共的二十大反“左”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欧美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加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插曲。对于左翼阵营来说，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红色政权即便可以用武装平息内乱，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紧一把发条，但发条上得再紧，很多零件已经出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没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60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沉重地偏移。共产主义的行情走低，在80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而愤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西方，寻找

面包、暖气、摇滚乐、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贬词。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30年代和60年代的经历深表忏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闪烁其言，或者三缄其口。相反，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成就，重新认识和评价个人主义之类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的流行话题，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彻底，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分和社会福利政策下刀，竟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

一个西方记者说，眼下除了梵蒂冈教皇和朝鲜，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现在还有多少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在继续憎恶利润和资本呢？还有多少听众会从这些政党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也许，这是一个传统左翼人士不愿正视的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

事情已经大变。对变化的过程，当然还需要由历史学家作出更周详更精确更清晰的描述。一个基本的现象，却不难在我们粗略的回顾中浮现，不难成为我们的视角之一：经过一个短暂的周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60年代再版了30年代，80年代则是以西方一片眩目的现代化昌荣，使50年代得到了追认和复活。

下一个10年，会怎么样？

再下一个10年或20年，又会怎么样？

我听到未来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30年河东，30年河西；物极必反，阴尽阳还；风水轮流转；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朴素把握，杂有过多神秘的揣测，两分模

式也显得过于粗糙。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历史是被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操纵？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是左还是右，还是别的什么，一种思想，是如何由兴到亡？一种体制，是如何由盛及衰？它们是如何产生然后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体制优势？如何获取然后丧失了自我调整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机能？如何汇聚然后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资源和道义光辉从而滑向了困局——乃至冷酷无情的大限？

想一想这些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傻。

三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1928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身徒步长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10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它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部录相带里看到的。录相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爬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流在陌生异乡的鲜血，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管关于他的录相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他新的生命——当时他同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1953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60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过的一本字迹模糊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80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现实感，拒绝相信和许诺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他描绘了资本主义正在汲取社会主义（比方社会福利政策），而社会主义也必须汲取资本主义（比方市场经济）的前景。他的很多观点，无异于后来大规模改革的理论索引。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加上因为公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入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比彭德怀的遭遇还要惨。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极为清醒地为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道的时候，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这是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火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和盛情。在一大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

仍然在为他 and 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惟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在家里来回踱步整整一个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启程。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入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一个极为普通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同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己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太多的日子空洞而苍白。

四

初读吉拉斯的时候，我还不大能接受他的奇异。再读吉拉斯的时候，又觉得他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拉区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

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但这些多样而且多变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情怀，透出了一种共同的温暖，悄悄潜入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进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历史一页页翻去，他们留下来了。各种学说和事件不断远退，他们凝定成记忆。后人去理解他们，总是滤取他们的人格，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残痕。他们似乎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体，辉耀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着具体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在当今一些批评家那里，即便再强健再精美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高温高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它。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性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地变成鬼脸或者丑画。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入检疫和消毒的流水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下人生状态 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长的精神基质和智慧含量，常